

高晓虹◎主编

杨凤娇

周逵◎副主编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中国新闻 传播研究

2016(上)

媒介化的暴力、网络霸凌与青少年
研究回顾和中国视角

吴炜华 丁 浩

重构电视：媒介化视角下手机电视的场域再造

赵希婧

从边缘到核心

大数据背景下数字记忆的发展与展望

邵 鹏

“媒介化”与性”与新感觉经验

《妇女杂志》中的图像话语分析

王 鑫

与历史

张晓萌 殷逸枫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中国新闻
传播研究

2016(上)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16. 上/高晓虹主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657-1932-5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中国—2016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9701 号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16 (上)

ZHONGGUO XINWEN CHUANBO YANJIU 2016 (SHANG)

主 编 高晓虹
副 主 编 杨凤娇 周 逵
策划编辑 王雁来
责任编辑 张 旭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932-5/G · 1932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编委会名单

主 编：高晓虹

副 主 编：杨凤娇、周逵

特邀编委：程曼丽（北京大学）、陈富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高钢（中国人民大学）

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黄瑚（复旦大学）、胡正荣（中国传媒大学）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李彬（清华大学）、罗以澄（武汉大学）

石长顺（华中科技大学）、时统宇（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君超（清华大学）

王甫（中央电视台）、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严三九（华中师范大学）

张晓玲（英国诺丁汉大学）、赵斌（北京大学）

编 委 会：陈刚、陈默、郭艳民、何苏六、刘宏、孟群、秦瑜明、隋岩、吴辉、王晓红、徐舫州

张雅欣、祝虹、周文、钟大年、赵淑萍、曾祥敏

执行编委：崔林、付晓光、顾洁、杨凤娇、周逵

目录

>>>> CONTENTS

媒介前沿

- 媒介化的暴力、网络霸凌与青少年:研究回顾和中国视角 吴炜华 丁浩 / 3
- 重构电视:媒介化视角下手机电视的场域再造 赵希婧 / 14
- 屏媒体时代时政报道的视觉呈现创新
——对2016年“两会”新闻报道的解读 郭艳民 王鑫 / 21
- 从边缘到核心:大数据背景下数字记忆的发展与展望 邵鹏 / 32

理论与历史

- “准摩登女性”与新感觉经验
——杜就田时期《妇女杂志》中的图像话语分析 王鑫 / 45
- 景观、人与历史 张晓萌 殷逸枫 / 59
- 节目主持人评价及其理论模型建构 高贵武 张丽 / 67
- 基于共生理论的京津冀传媒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王春枝 / 79

视听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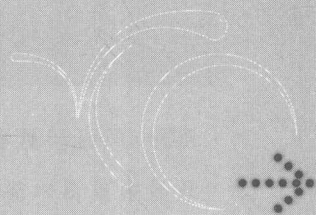
- 视频直播新常态:移动化、社交化、矩阵化 包圆圆 / 91
- 华语电影中同性恋银幕形象的演化研究
——从历史发展脉络的视角 胥琳佳 李海力 / 101

艰难的去“污名化”

- 从健康传播学的视角考察艾滋病的影像呈现 夏丽丽 / 116
- 跨文化语境下的受众研究:中国观众对美剧解读的诠释学分析 刘 杨 / 124
- 台湾大学生对《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纪录片的解码
张梓轩 岳景萱 郁丹霞 张 涵 / 139

新媒体

- “巴巴爸爸”去世引发的“80后”在线童年回忆研究 季芳芳 / 149
- 打造新媒体时代中国公共事件的分析架构
——以“微博打拐”为例 孙祎妮 / 158
- 新生代媒介的构建:香港青年社交网络中的文本流动与文化变迁
——以“100毛”Facebook 专页为例 何萸萸 / 166
- 社会·话语:网络流行语与时代的共变 孟繁静 / 178
- 互联网使用和社会组织参与之关系:对中美两国相关数据的分析
蒋亚隆 闫 婧 / 186



媒介前沿

媒介化的暴力、网络霸凌与青少年：研究回顾和中国视角

吴炜华 丁 浩

重构电视：媒介化视角下手机电视的场域再造

赵希婧

屏媒体时代时政报道的视觉呈现创新

——对2016年“两会”新闻报道的解读

郭艳民 王 鑫

从边缘到核心：大数据背景下数字记忆的发展与展望

邵 鹏

媒介化的暴力、网络霸凌与青少年：研究回顾和中国视角

Cyberbullying, Social Media and the Adolescents:
Research Review and Chinese Perspective

◎ 吴炜华 丁 浩

Wu Weihua Ding Hao

摘要：本文对网络霸凌研究在国际与国内的发展现状与研究内容展开回顾，试图梳理在其概念、界定的形成过程中的知识谱系，并对网络霸凌研究中所集中展开的霸凌激发的差异性变量进行归纳。最后，本文在网络霸凌研究的中国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网络霸凌，社交媒介，青少年

Abstract: This paper maps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cyberbullying studies internationally and nationally, by which it aims to look at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cyberbullying in the small history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t reviews the differences of variable factors emerged within most of cyberbullying studies and also reveals the Chinese patterns of research trends so as to offer a possible assumption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cyberbullying, social media, adolescents

网络霸凌作为一种在互联网和移动传播中出现的媒介化的暴力现象，近年来，已经成为网络心理学、健康传播、青少年研究领域一个跨学科、国际性的研究热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社交传播与移动媒介的迅猛发展，原先聚焦于以电话、邮件、校园网为载体传播的网络霸凌也迅速扩展到社交媒介、网络娱乐以及某些网络公共信息领域。网络霸凌在“自媒体”化的传播环境中找到了生长的土壤，培养了活动能力，其表现模式、激发状态与特点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搜索引擎到网络社区，再到社交媒体平台中的网络霸凌，网络霸凌研究特别关注网络霸凌的触发、扩散和影响以及青少年人群在遭遇霸凌时所受到的伤害、影响及应激状态。本文在解读目前的研究趋势和文献阅读的

基础上,尝试对网络霸凌的国际和国内研究展开框架性的梳理,并对网络霸凌的学术界定和中国视角予以阐释与分析。

一、从网络暴力到网络霸凌:界定与类型

虚拟霸凌作为一种互联网环境中出现的暴力与欺凌行为,一方面,它延续着传统霸凌的某些行为特征,即恶意的、反复发生的,旨在对他人造成目的性的伤害;另一方面,网络霸凌也呈现出异于传统霸凌,超越人际与同侪霸凌环境的更大的社会危害与恶性的传播影响。网络霸凌是一种媒介化、社交化和虚拟化的霸凌,其引发渠道更为多样化,表现形式和危害的隐蔽性也更强。

网络霸凌的研究在 20 世纪的后十年逐渐出现。网络暴力(Cyberspace Violence)是最早浮现于互联网与网络空间中对虚拟的网络人身攻击、谣言散播和恶意伤害进行描述的一个词汇。在瑞典和法国,1993 年前后出现了关于网络暴力、网络骚扰的研究个案。但直至 2000 年后,网络空间(cyberspace)与霸凌(Bullying)才逐渐组成一个全新的网络研究的新词“网络霸凌”(Cyberbullying)。与此同时,网络暴力、虚拟欺凌(Virtual Bullying)、网络骚扰(Cyberspace Harassment)也作为网络霸凌的同义词依序出现,以形容和描绘在网络环境中的同侪欺凌、语言暴力和谣言攻击等行为。在美国,较早的全国性研究案例出现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儿童罪案防治研究中心。该中心以问卷调研的形式对全美约 1501 名年龄在 10—17 岁之间的青少年,进行潜在的、不安全网络行为与影响的调查。数据显示,约有 6% 的青年被访者表示他们曾经遭受某种形式的网络骚扰与谣言攻击,2% 的被访者声称所受到的网络霸凌令自己难以承受。在报告中,网络霸凌(Cyberbully, Cyberbullying)一词并未出现,该研究以“在线受害者”来描述“遭遇网络霸凌的”青少年人群。^①

在本文写作之前,我们以“网络霸凌”为研究关键词在 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文献数据库进行了数据搜索。在 PubMed 所搜的 314 篇网络霸凌的期刊论文(不包含专著与研究报告)中,较早的一篇可追溯到 2006 年的《针对女孩和未成年女性的网络暴力》。而事实上,2006 年前后,欧洲和北美区域就网络霸凌所展开的政府调研和相关法规条款的修订已然初露头角。在中国,网络暴力的相关报道也在此时逐渐出现,2006 年前后,部分媒体对 2004 年“川航张敏佳(小小马哥)事件”的重新挖掘以及与

^① Finkelhor, D., Mitchell, K. J., & Wolak, J. (2000). *Online Victimization: A Report on the Nation's Youth*. Alexandria, VA: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

“虐猫事件”的报道,引起网民的集体关注。随后引发的网络攻击与“人肉搜索”呈现出与国外网络霸凌的发展极为相似的传播特征,引起了新闻媒体和学者们对群体性“网络暴力”与“网络霸凌”的关注。

在国际研究中,从较为宽泛和界定模糊的“网络暴力”到概念相对明确、指代清晰的“网络霸凌”一词的过渡,彰显了该研究在近十年中显化和学术共识的逐渐形成,网络霸凌的研究也从青少年研究、教育研究、网络社会学、网络心理学的领域扩展到成年人、职场、性别、网络游戏甚至跨国研究等领域。但在中国,网络霸凌仍然是校园欺凌和网民行为研究的学术潜文本,混迹在“网络暴力”的研究之下,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一方面,网络霸凌的概念界定在国内的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其行为模式和认识在学者、教师和网民群体中也存在着明显差别。另一方面,在文献梳理中,我们也发现,国内的研究对网络霸凌、网络暴力的表述与分类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涵义交错、指代模糊和相互借用的现象。有学者提出,网络霸凌作为一种新近被学术界和司法界发现的网络现象,其定义需要从其发生环境、行为的发出者和受害对象以及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各类危害等方面进行界定。^①《人民日报》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网络暴力”的行为特征总结如下:(1)从道德制裁和审判出发,恶意地干涉当事人的现实生活;(2)通过恶意搜索、公布传播他人隐私,煽动和纠集人群以暴力语言进行群体围攻;(3)在现实生活中使当事人遭到严重伤害并对其产生实质性的威慑。

在本文的研究回顾中,我们不纠结于网络暴力与网络霸凌的本土情状,而将网络霸凌界定为基于网络的具有恶意、羞辱性、攻击性和煽动性的侵权和暴力行为。

根据触发机制和信源差异性的影响,从传播层级上,可将网络霸凌分为以下三类:(1)公共领域的群体性网络暴力:以网络新闻、社会事件引发的群体极化的“群骂”“人肉”为代表;在此,网络暴力被界定为更为广义的网络霸凌;(2)网络族群的倾向性暴力:以“爆吧”“网络对骂”为代表;(3)社交环境中的单向性、针对个体的暴力:以青少年群体的“社交孤立”“网络起底”“持续性人身攻击”等霸凌型暴力为代表。这三种传播层级所引起的网络社会与文化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别。

在文献的梳理中,我们撇开狭窄的词语表述的差别,直接关注其研究领域之知识谱系的构成。在研究趋势上,我们对 PubMed 文献数据库 314 篇期刊论文文献进行了年度归纳,“网络霸凌”呈现出极为清晰的研究递增趋势,近三年尤为明显(见图 1)。

Web of Science 文献数据库过去五年的 274 篇期刊论文文献的发表情况也显示

① 张乐:《青少年网络欺凌研究综述》,《中国青年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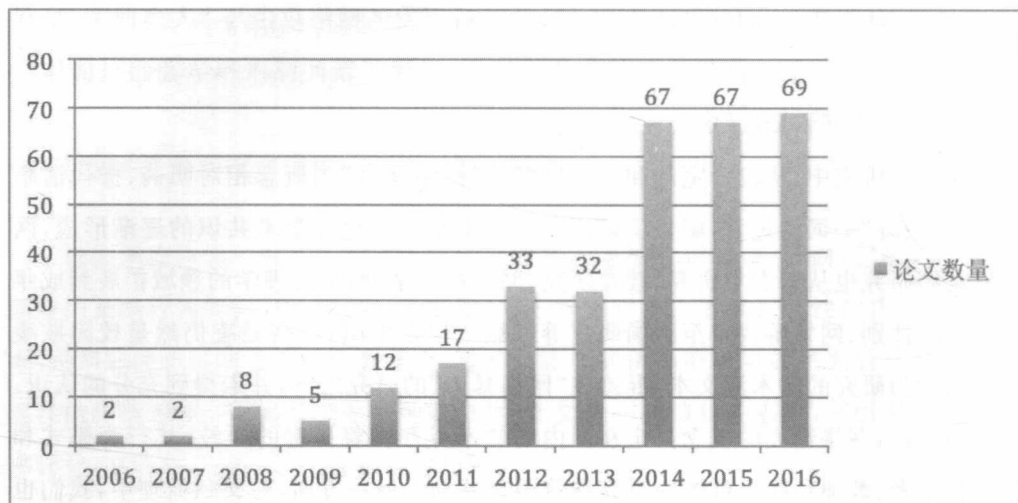


图 1

出这一趋势(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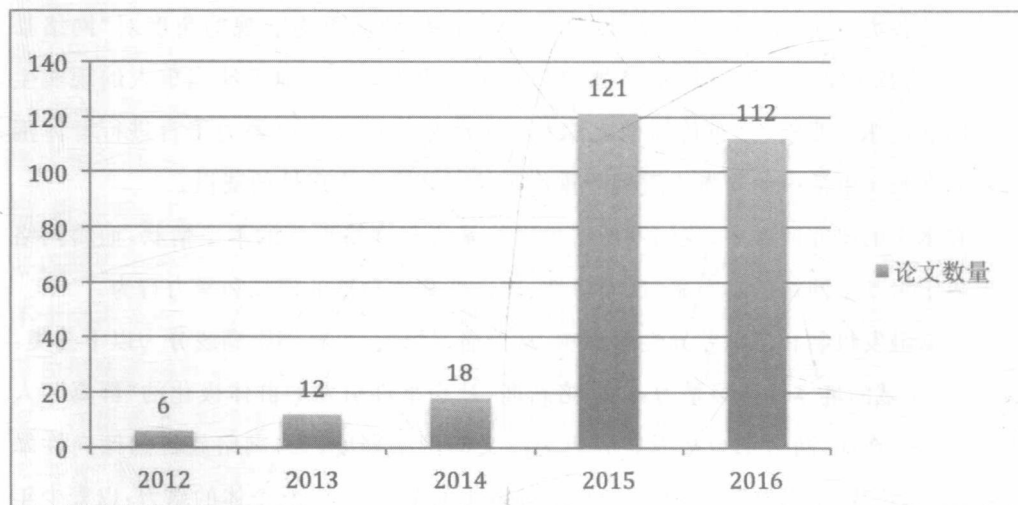


图 2

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于网络霸凌现象的研究实践和中国网络欺凌愈演愈烈的现实是研究网络欺凌问题的理论基石和现实基点。从网络暴力到网络霸凌,我们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网络霸凌行为界定与传播影响的研究;关于网络霸凌普遍性和类别的研究;关于网络霸凌的产生原因与社会危害的研究等等。

二、媒介化的暴力与霸凌

对于青少年实施网络霸凌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一致将其分为主观和客观因素。在客观层面,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为网络霸凌提供了混乱生长的平台;在主观层面,是指青少年人群对社交媒介的积极拥抱与日常化使用。社交媒介的自我呈现与日常印象管理已经成为青少年人群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在进行实时通话和访问社交网站时,成为被霸凌的对象,而那些霸凌者往往是他们的同学。^① Ellison 等在对社交媒体的调查中指出,青少年使用的社交网络通常用于连接所谓的“弱关系”,有时甚至是陌生人。^② 许多青少年实施霸凌是因为通过网络无法直接接触对方,觉得好玩,是“欺负别人的游戏”,或者觉得很有“面子”。而另外一些人,因为觉得借助社交媒体实施的霸凌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因而更有成为霸凌中“施暴者”的倾向,使得他们想在网络上释放压力,或试图控制他人。他们认为在网上没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令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地实施霸凌行为,并加大了施害程度。

研究发现,某些传统霸凌中的受害者会在网上实施报复,转而变为网络霸凌的实施者。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网络霸凌行为持续时间短(一个月左右),但四分之一的网络霸凌行为会持续较长时间。^③

2013 年 11 月,广州、香港、澳门三地青年协会组织发布了《穗港澳青少年网络欺凌调查报告》。该报告是中国网络霸凌研究中较早的一项跨地域研究成果,73.7%的受访者曾旁观网络霸凌事件,63.7%的受访者曾被别人霸凌,17%的受访者曾霸凌他人。同时身为霸凌—被霸凌者与与被霸凌—霸凌者的比例约为调查样本的 16% 和 19%。青少年的霸凌行为与角色转换(受害与复仇)在三地的调研中也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形态。

除此之外,也许有人会以为网络霸凌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伤害,而对霸凌者并没有什么影响,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跨地区的研究显示^④:网络霸凌中的受害者达到中

① 李静:《论青少年网络欺凌及其干预》,《少年儿童研究》2010 年第 6 期。

② Ellison, N. B., Steinf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③ 李静:《论青少年网络欺凌及其干预》,《少年儿童研究》2010 年第 6 期。

④ 广州市青年文化宫、香港游乐场协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穗港澳青少年网络欺凌调查报告》,2013 年。

度的焦虑,而施暴者的抑郁及压力指数更高于受害者。^① 相对于被霸凌者和被欺凌者(转化)的霸凌者,霸凌者存在的问题可能更倾向于外化。^②

同时,根据汪耿夫等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网络霸凌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影响是致命的,直接或间接导致其做出自杀行为。网络霸凌他人、被他人网络霸凌、既网络霸凌他人又被他人网络霸凌均是自杀相关心理行为。在对安徽省北中南三个地域各一所初高中学校的学生所做的网络霸凌调查显示,自身条件不同的学生,诸如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与父母关系、自评学习成绩和亲密朋友个数,其自杀意念报告率差异、自杀计划报告率差异、自杀准备发生率差异、自杀未遂报告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③

由此可见,网络霸凌在社交媒体中的表现是较为直接和外放的。并且网络霸凌不单单表现在对施暴者的心理健康的简单影响上,对其生理上的健康存在也有一定的威胁,同时,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霸凌的双方角色更容易重叠,使得受霸凌者更容易转变或增加霸凌者的属性。

三、网络霸凌触发的差异性研究

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与父母关系、自评学习成绩和亲密朋友个数的青少年在网络霸凌中受到直接影响的报告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探讨网络霸凌触发环节中的差异性元素,对虚拟欺凌的效果和程度判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社会性别是影响网络霸凌触发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于社会性别在网络霸凌中的身份属性来说,多项研究发现,青少年网络霸凌行为中受霸凌者多为男性,网络施暴者也多为男性。女性会参与较为间接的霸凌行为,包括心理和情感骚扰,如散布谣言等。^④ 在大学生人群中,男生相对女生,被别人网络霸凌的比率更高。在大学生中,有被网络霸凌经历的占 18.80%。男生被别人网络霸凌的比率为 26.50%,显著高于女生的 11.90%。被网络霸凌的性别差异,和已有学者研究提出的“男性受网络霸凌行为显著高于女性”结果一致。^⑤ 但另一份国内研究显示,男生更容易霸凌别人和成为

① 姜萍:《当代青少年“网络欺凌”现象探析》,《广西教育》B版,2014年第6期。

②③ 汪耿夫、方玉、江流、周贵阳、袁姗姗、王秀秀等:《安徽省中学生网络欺凌与自杀相关心理行为的关联研究》,《卫生研究》2015年第6期。

④ 李静:《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与防范对策》,《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8期。

⑤ 江文、吴思仪、叶丽怡、周寿明:《地方高校大学生网络欺凌应对方式调查研究》,《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霸凌—被霸凌者,女生更容易成为被霸凌者。^①

相较于国外的类似研究,其结果与上述国内调查研究结果可能在某些环节上有出入。例如,根据 Siyahhan S 等的研究表明^②,男性青少年人群比女性更容易成为网络霸凌的被霸凌者、霸凌—被霸凌者、霸凌者。另有研究显示,女生更容易成为网络霸凌的被霸凌者和霸凌—被霸凌者,男生更容易成为霸凌者。根据 Khoury-kassabri M 等的研究表明,^③6、7 年级学生网络霸凌他人和被他人网络霸凌的报告率之间不存在性别差异;9、10 年级学生网络霸凌他人的报告率不存在性别差异,但 9、10 年级女生被网络霸凌报告率高于男生。这些研究的差异也显示了青少年人群对网络霸凌的识别度、认识、反馈与应激模式的差异。

在青少年人群在认知网络霸凌的严重程度上,Sara Bastiaenssens 等人的调查^④显示,男性对于严重性的认识能力要显著低于女性。男性青少年人群在遭遇网络霸凌的过程中,因为欠缺敏感性、认知能力以及男子气概的误导,易出现严重霸凌后果,霸凌自杀事件的可能性更高。

总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成果表明,男性更容易在网络霸凌中以霸凌者的身份出现,女性更容易以被霸凌者的身份出现。但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区,青少年在社会性别上的霸凌身份与差异会发生交换。

对青少年人群在网络霸凌中的表现属性而言,虽然大部分网络霸凌的受害者和目击者都没有向成年人(老师、家长)报告受霸凌的事实,但调查受访的女性青少年表示,如果碰到这种状况会毫不犹豫地反击。而相对于男性,处理与应对技巧较差,不成功的比率更高。研究表明,女性青少年人群更愿意去尝试处理与应对网络霸凌,但是效

① 汪耿夫、方玉、江流、周贵阳、袁姗姗、王秀秀等:《安徽省中学生网络欺凌与自杀相关心理行为的关联研究》,《卫生研究》2015 年第 6 期。

② Arıcak, T., Siyahhan, S., Uzunhasanoglu, A., Saribeyoglu, S., Ciplak, S., & Yilmaz, N., et al. (2008). "Cyberbullying among Turkish Adolescent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Multimedia & Virtual Reality on Behavior & Society*, 11(3), 253—261.

③ Mishna, F., Khoury-Kassabri, M., Gadalla, T., & Daciuk, J. (2012). "Risk Factors for Involvement in Cyber Bullying: Victims, Bullies and Bully-Victims".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Review*, 34(1), 63—70. Mishna, F., Cook, C., Gadalla, T., Daciuk, J., & Solomon, S. (2010). "Cyber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0(3), 362—374. Kowalski, R. M., & Limber, S. P. (2008). "Electronic 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1(6 Suppl 1), S22—30.

④ Bastiaenssens, S., Vandebosch, H., Poels, K., Cleemput, K. V., Desmet, A., & Bourdeaudhuij, I. D. (2014).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to Bystanders' Behavioural Intentions to Help the Victim or Reinforce the Bull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34), 259—271.

果相较于尝试处理的男性的效果要差。^①

男女在网络霸凌中附加作用的获得情况也有所区别。例如 Bauman S 等的研究表明^②,抑郁症状仅在女生中是被欺凌者与自杀未遂之间的中介因素。而在男性群体中,尚未有数据证明网络霸凌引发严重心理疾病的合理性。

在网络霸凌触发和实施中,另一个影响因子是霸凌双方的年龄。在东莞地区大学生调查研究^③和安徽三地初高中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受访学生对于了解或参与霸凌的经历普遍存在,其中,初二学生网络霸凌行为的报告率最高。这表明,青少年的霸凌行为与他们对被霸凌的处理能力之间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小,参与网络霸凌的报告率越高,他们对被霸凌的处理和应对能力越低。而对大学生来说,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网络霸凌的自我处理能力的差异并不显著。选择“非常懂得处理”和“比较懂得处理”的学生比率随年级的增长而增高,而大一学生的选择比率相比其他年级是最低的。

另一个影响变量是父母的影响。根据 YANG Sujin 等的调查表明,^④母亲文化程度和中学生自评学习成绩对网络霸凌行为也具有一定影响。初中文化程度的母亲,其孩子参与网络霸凌行为的比例最高,参与网络霸凌(作为霸凌者,被霸凌者和霸凌一被霸凌者)的频率也最高,其次为初中以下学历。

除此以外,学习成绩也是虚拟欺凌中的另一个影响变量。根据汪耿夫等人的研究,^⑤中等成绩的学生参与网络霸凌行为的报告率最高。此外,学习成绩差作为霸凌的危险因素已经得到了证实。

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和旁观——近年来也成为网络霸凌研究中一种重要的关注热点。网络霸凌每每会致使大量的、无目的性的旁观者出现,这些霸凌的旁观者的存在

① Sameer Hinduja, & Justin W. Patchin. (2007). "Cyberbullying: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Offending and Victimization". *Deviant Behavior*, 29(2), 129-156.

② Bauman, S., Toomey, R. B., & Walker, J. L. (2013). "Associations among Bullying,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e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6(2), 341.

③ 江文、吴思仪、叶丽怡、周寿明:《地方高校大学生网络欺凌应对方式调查研究》,《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④ Yang, S. J., Stewart, R., Kim, J. M., Kim, S. W., Shin, I. S., & Dewey, M. E., et al. (2013). "Differences in Predictors of Traditional and Cyber-bullying: A 2-year Longitudinal Study in Korean School Children".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2(5), 309-318.

⑤ 汪耿夫、方玉、江流、周贵阳、袁姗姗、王秀秀等:《安徽省中学生网络欺凌与自杀相关心理行为的关联研究》,《卫生研究》2015年第6期。

可能是(有意或无意)“路经”“跟随”“认知”和“处理”。^① Salmivalli 等人在研究中发现^②,旁观者对霸凌事件的回应大致分为三种不同方式:作为一个局外人,协助或增强参与霸凌,支持和维护受害者。

研究表明,旁观者行为与青少年的网络同伴关系(与现实同伴关系不同)在网络霸凌研究中显著相关,缺乏同伴支持和被同伴霸凌与自杀意念、自杀未遂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网络霸凌所激发的孤独感与网络同伴关系和自杀意念、自杀未遂之间关系的中介因素具有统计学意义。^③ 当旁观者对网络霸凌的行为有主动回馈时,霸凌者往往会从其旁观反馈中得到一种虚拟奖励式的成功感,因而使得网络霸凌者和霸凌事件变得更加咄咄逼人。^④ O'Connell 的研究认为,旁观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网络霸凌过程中,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霸凌的认可、鼓励与支持。有时候,旁观者对霸凌的事实持观望态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允许霸凌发生。在网络霸凌爆发之时,其他旁观者是友人关系相较于当其他旁观者只是相识关系之时,旁观者会因恶作剧和损友情结而有更大的行为意图参与霸凌。Salmivalli 认为,旁观者参加或者对霸凌的过程持支持态度,会增加被霸凌者在霸凌过程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比如引起更多当事人的焦虑和抑郁。相反,Hawkins 等人发现,旁观者若是对被霸凌者持支持态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霸凌者的地位,并且令他们考虑终止霸凌。

此外,旁观者在霸凌性质严重的情况下会更可能帮助受害者。对于旁观者是否有意向采取行动帮助被霸凌者,Sara Bastiaensens 等人所做的研究显示,在霸凌程度较轻的情况下,作为好朋友关系的旁观者相对于仅仅是相识关系的旁观者,对于被霸凌者的帮助意图较小。而在严重的霸凌事件中,作为好朋友关系的旁观者相对于仅仅是相识关系的旁观者,对于被霸凌者的帮助意图则较大。但是在网络霸凌发生过程中,旁观者对于事件严重程度的理解会直接影响旁观者以不同身份参与霸凌互动。Sara Bastiaensens 等人发现,目前的“帮助意图”仅仅表现为,旁观者在施救或干预过程中,仅使用“安慰受害者”或者“给受害者建议”等方法进行施救,真正的干预效果很难得到

① Latané, B., Darley, J. M. (1970).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Educational Division*.

② Salmivalli, C. (2010).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 *Aggression & Violent Behavior*, 15(2), 112—120.

③ Cui, S., Cheng, Y., Xu, Z., Chen, D., & Wang, Y. (2011). "Peer Relationships and Suicide Ideation and Attempt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37(5), 692—702.

④ Pepler, D., Craig, W., & O'Connell, P. (2010). "Peer Processes in Bullying. Inform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S. R. Jimerson, S. M. Swearer, & D. L. Espelage (Eds.), *Handbook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469—479).